



江苏师院学报增刊

JHUSIN

集 摆 鑄

喊 呐

将被小



木刻
纪程

壹

引言	王集
王集	王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王集
集
集
集
集

苏联柯勒连支

版画选集

1976.8

PDG

目 录

- 鲁迅的学生时代和在中学教书的时候 绍兴鲁迅纪念馆 张能耿 (1)
- 鲁迅的外婆家——安桥头 绍兴合丰大队党支部 (63)
- 掷向封建旧教育制度的锋利投枪 绍兴钢铁厂 何星伟 (67)
- 略谈鲁迅小说的创作方法 浙江省文化局 钦 文 (79)
- 《理水》简析 绍兴地区师范 谢德统 (96)
- 上旺纪行 工农兵学员 苏胜夫 (107)
- 参观鲁迅故居和三味书屋 工农兵学员 王欣欣 (113)
- 难忘的印象 深刻的教育 工农兵学员 俞 琳 陶惠娟 (117)
- 鲁迅与农民 工农兵学员 袁雪洪 徐宗文 (127)
- 路 工农兵学员 张仁明 (140)
- 赞“一发而不可收” 工农兵学员 吴佩华 (143)

“金不换”小议	工农兵学员	卞兆明(147)
鲁迅的战笔	工农兵学员	徐惠良 邹玲曼 朱火泉(150)
学习鲁迅的无产阶级硬骨头精神	工农兵学员	袁洪发(154)
革命的襟怀 坚定的信念	工农兵学员	虞锦华(158)
学习鲁迅，艰苦奋斗干革命	工农兵学员	宓励平(161)
学习鲁迅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	工农兵学员	谢天真(164)
学习鲁迅 认真读书	工农兵学员	俞弘声(167)
不务虚名，是无产阶级的高贵品质	工农兵学员	徐云葆(170)
决不允许历史的悲剧重演	工农兵学员	金根寿(174)
学习鲁迅，决不做旧教育制度下的“木偶人”	工农兵学员	瞿慰年(176)
教育“必须和实社会接触”	工农兵学员	陈伟(179)
从文学的起源谈起	工农兵学员	金溢清(182)
王金发的教训	工农兵学员	陆志坚(184)
资料	关于鲁迅的故乡及鲁迅作品中的两个历史人物	绍兴县文化馆 周蒂棠(187)
编后记		(212)

鲁迅的学生时代和在中学教书的时候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在绍兴讲)

绍兴鲁迅纪念馆 张能耿

毛主席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于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诞生在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宅，并在这里度过了少年时代，也就是在封建私塾读书的时代。一八九八年离家去南京，完成了中学时期的学业（当时他读的是中等专业学校）。后来考上公费去日本留学，在东京和仙台度过了高等学校求学的时代。鲁迅在学生时代，对于旧教育制度的弊害有着深切的体会，而且敢于对那时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造反，是一个旧制度的造反者。鲁迅二十九岁那年，回到了国内，先后在杭州和绍兴任教员、教务长、校长等职。鲁迅是一位深受进步学生欢迎的师长。他同学生的关系，既是师生，又是战友，同在一条战壕里，为推翻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二千多年封建专制政体而共同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许多方面，至今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私塾的先生和社会的老师

鲁迅诞生的时候，上距鸦片战争四十一年。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中国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开始。由于清朝政府的

腐败，各帝国主义国家便纷至沓来，今天割地，明天赔款，中华民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其间虽然也曾发生过规模巨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但最后都被中外反动派互相勾结起来镇压下去。鲁迅诞生的时候，距太平军最后离开绍兴仅十八年。当时的清朝政府在各地人民起义的冲击之中，虽已是苟延残喘，但还在作垂死挣扎。它所赖以生存的思想武器，仍然是孔孟之道。清朝反动政府为了用孔丘这块敲门砖来延长封建主义的寿命和敲开它的“幸福之门”，甚至把孔老二的地位抬得更高了。正如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说：“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使发一定的议论。”鲁迅学生时代，由于先后受到封建主义教育制度和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摧残和迫害，就是这样“悲哀”地过去的。

鲁迅认为一个革命者要不断前进，就必须在前进的道路上一面“清洁旧帐”，“一面开辟新路”。因此他在革命的道路上，总是不断地严于解剖自己，不断地进行吐故纳新。这时候，鲁迅每当检查到自己思想上的弱点的时候，总是回头谈到自己的家庭出身和读过的古书给他带来的影响。

鲁迅小时，家里有四、五十亩水田。祖父周福清，是清朝的翰林。周福清在仕途上是自负的，一八七五年去金溪县做知县。那里的上司大概不是科甲出身，周福清为他看不起，所以在一八七八年就被参劾。后来改任教官，由于不愿意坐冷板凳去看守孔庙，于一八七九年到北京，一直在那里候补，直至一八八八年才任为内阁中书。鲁迅诞生的时候，正是他祖父在北

京候补的时候。当家里人报讯给周福清，说他已添了孙子，他就给鲁迅取名为樟寿，所以小名叫樟官，号豫山。后因“豫山”与绍兴话“雨伞”同音，同学要开玩笑，祖父给他改为豫亭；后又改为豫才。鲁迅父亲是个读书人，一直准备赴考，结果进了秀才，但始终没有考上举人，在仕途上一直没有找到过出路的。后来他对仕途也不热心了，成为一个维新思潮的同情者。鲁迅母亲是绍兴乡下人。后来鲁迅的祖父入了狱，父亲生了病，家里有很长时间是由母亲主持家务的，所以鲁迅和母亲的关系更为密切。在他的文章里，有很多地方提起他的母亲。

鲁迅在私塾读书的生活是七岁开始的，曾经读过三个私塾。第一个私塾的地点在新台门，与鲁迅家同一座房子，所以比较方便。塾师叫周玉田，是鲁迅的叔祖。鲁迅在他那里受的是启蒙教育，最先读的是《鉴略》，鲁迅在文章里提到过。书桌上除了对课的课本，不允许放别的书。鲁迅到底在这里读了几年书，也已说不清，大概是读到十一岁。十二岁时，换了一个私塾，塾师叫周子京，也是鲁迅的叔祖。“前清时代，一个塾师能够不查他的秘本，空手点完了《四书》，在乡下就要算一位大学者”了。（《鲁迅全集》第五卷第460页）可见那时以传授孔孟之道为职业的封建塾师，大多是骗人的。鲁迅的两个塾师，周玉田是个秀才，周子京却一直没有考上秀才，是个不学无术的人。他教课极不负责，批改的作业错误很多。有时鲁迅把作业本带回家去，他父亲看了真是哭笑不得。鲁迅在周子京那里大约读了一年，以后又换了一所私塾，就是“三味书屋”。“三味书屋”不在新台门，是塾师开设在自己家里的私塾。鲁迅这样说：“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

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扁道：三味书屋；扁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这个先生叫寿镜吾，也是秀才。现在对这个人，从有关的研究文章看，评价不一，有的说他是“腐儒”，有的说他是一个正直的人。至于教育内容，当然只能同所有的私塾先生一样，教些《四书》《五经》，传播些封建文化，要求他去突破是困难的。鲁迅讲过寿镜吾“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这不单是传闻，而是鲁迅自己的体会。三味书屋一般收八个学生，中间是塾师的座位，学生在旁边，很多桌子是对着墙壁的，大家背靠背，塾师以为这样学生就不好吵闹。同其他的封建私塾一样，三味书屋塾师的桌上也放有一根戒尺，要打手心的，而且还有罚跪的规矩，但是都“不常用”。寿镜吾的严格主要表现在对学生要求上。这些要求当然也只是叫学生按照封建主义的教学内容去拼命地用功读书。鲁迅小时对那些孔孟之道很不感兴趣。他在以后的回忆文章中，对这个老塾师也只是肯定其可取部分，对落后方面当然还是作了严厉的批判的。解放后，我们碰到过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的两位同学，其中一个是章祥耀，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提到过他说：“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另一个是鲁迅的堂叔，叫周梅卿，住在老台门的。寿镜吾先生的后代解放后还在。他的儿子和媳妇都在北京。据他们介绍，鲁迅在三味书屋时，很喜欢看图画书和画图画，特别是影描绣像。绣

像就是古典小说前面的书中人物的图像。后来鲁迅在《连环图画琐谈》一文中说：“明清以来，有卷头只画书中人物的，称为‘绣像’。有画每回故事的，称为‘全图’。那目的，大概是在诱引未读者的购读，增加阅读者的兴趣和理解。”鲁迅有时也搞一点创作。周建人同志在《鲁迅放学回来时做些什么》一文中说：“他有一次给我画了一个扇面，是一块石头，旁生天荷叶（俗称，书上称虎耳草），有一只蜒蚰螺（俗称，即蜗牛）在石头上爬。并有些杂草，纯用墨画的。”据鲁迅的同学说，在三味书屋里，塾师发觉学生画画就要没收的，还要打手心，说是你不专心读孔孟之道。因为那时读书应考，做了官才是正路，否则就是“呆子”。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一文中说：“我们那时有什么可看呢，只要略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我的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地翻开第一叶，看那题着‘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像，来满足他幼稚的美爱的天性。昨天看这个，今天也看这个，然而他们的眼睛里还闪出苏醒和欢喜的光辉来。”日后在鲁迅的文章中，对于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有过极为严厉的控诉。

学生们在三味书屋读书，没有上课、下课，更没有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也没有其他活动，唯一的是小便出去的时候可以活动一下。学生早晨上学后就要把昨天上的书背出来，背课以后是上书。后来鲁迅在《人生识字胡涂始》一文中说：“我们先前的学古文……，教师并不讲解，只要你死读，自己去记住、分析、比较去。弄得好了，是终于能够有些懂，并且竟也可以写出几句来的，然而到底弄不通的也多得很。”封建私塾的教育方法就是这样的。上书后学生便哇啦哇啦地读书，快

到中午时写大字，六个字一行写六行，写过大字就放学吃中饭了。下午上学后又是读书，到傍晚对课。对好课，一天的功课就算完了。这样的私塾生活，对小孩来说是多么的枯燥乏味。环境又差，不但光线暗，而且又潮湿。三味书屋在当时还算是比较开明的，其他有些私塾，封建压迫和体罚的情况就更为严重。寿镜吾对学生进行控制的办法就是背书。早晨上学时背前一天的书，十五天一下来要背半个月的书，月底要背一个月的书，年底要背一年的书。背一年的书就是大考，背了书可以回去。周梅卿和章祥耀说，一到年底我们就急急忙忙地读书，疙疙瘩瘩地背书。读熟一本背一本，全部读好一起去背，背过就全部忘光了。鲁迅不这样，到十二月十几日之后就不来了，就在家里读书，读熟了，把书往老师桌上一放，能一下子背光。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有一个书签，书签上写着：“心到口到眼到读书三到”。有一次寿镜吾的儿子给大家默字，默的是《诗经》里的一段话，笔划很多很难，鲁迅全部默了出来，一笔一划都没错，可见他读书时连笔划都是看清楚了的。

学生读书，老师也读书，摇头晃脑地读。老师是掌握学生的，学生也是掌握老师的，师生互相掌握，规律互相摸。老师读书读得入迷时，是学生活动最方便的时候。这时学生往往乘机到后院去玩。鲁迅说：“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到园里的人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发觉后，就在书房里大叫起来：“人都到那里去了！”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先轻声读书，然后慢慢地读响来，当大家都高声地读起来的时候，鲁迅说：“真是人声鼎沸”，好象一锅烧开了的水一样。老师一听，大家都在读书了，事情也就

过去了。学生们就这样地被禁锢在孔孟之道的圈子里。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一文中说：“回忆起我和我的同窗小友的童年，却不能不……给我们的永逝的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鲁迅少年时代的学习生活就是这样地在封建主义教育制度的压迫下，“悲哀”地过去的。因此，他对旧的教育制度非常反感，在写《狂人日记》的时候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我的理解也包括这样的意思，就是呼吁要使我们下一代不要再受孔孟之道的摧残，不要再受孔孟之道的毒害。鲁迅的这一理想，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直到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才得到了实现。

鲁迅在同日本友人增田涉谈话的时候，曾谈到过他小时候因为读书不大用功，受到过祖父的责骂，后来看了一本名叫《西游记》的小说，才对书引起了兴趣。鲁迅小时候要看到他所喜欢的书是很不容易的。那时绍兴有很多私人藏书楼，但没有公共图书馆，更没有象现在这样规模很大的鲁迅图书馆。鲁迅的祖父是同意和提倡儿童先看点小说的，他认为这样可以把小孩的思路打开。鲁迅的父亲也不反对。有一次，他在鲁迅的席子底下发现了鲁迅画的画，鲁迅当时很担心：这下可要被责骂了。结果他父亲只是看了一下，笑了笑，又放回了原处。把关的人一放松，鲁迅就利用新年的压岁钱之类大胆地买书了。但那时也只能买到一些古书，当然鲁迅是经过选择的，他所买的书，主要是美术书和野史笔记，以及小说和植物学方面的书籍。在古书中鲁迅最喜爱看野史笔记，因为封建时代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涂饰太厚，野史不是史官写的，倒有些反映人民要求的真实材料。如关于王充等人的材料，后来就编入了他在辛亥革命前后辑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中。

鲁迅小时买书，遇到封面不好，他就自己重新装订。放在箱子里时，大的归大的，小的归小的。因为书要防蛀，就在缝里放上樟脑丸，一小包一小包的放在里面。

在鲁迅所搜集的书籍中，有很多是关于植物学方面的书，如《南方草木状》、《群芳谱》、《广群芳谱》、《花镜》、《农林全书》等等。有的他还一字一句的抄过，如陆羽的三卷《茶经》和陆龟蒙的《耒耜经》与《五木经》等，辛亥年春天，又抄了《竹之谱》、《筭谱》等五、六种谱录。据周建人同志在回忆文章里说，鲁迅从三味书屋读书回来，常常翻看《花镜》。书里有很多宝贵的经验与理论，特别是指出通过人工培育可以改变植物特性，强调“人力可以回天”的思想。鲁迅由于受环境的影响，加上看了许多古代关于植物学方面的书，因此对植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进一步钻研，他就自己动手，种了很多花木，包括有几种可以作中药的植物。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鲁迅对书中的一些说法有了自己的见解，就把它写在书上。譬如“映山红”，属于杜鹃类的花，若要从山上移栽家园，要用原来山上的土壅方能种活。鲁迅实践以后，认为不一定用原来山上的土，于是他在《花镜》上批道：“按，花性喜燥，不宜多浇，即不以本山土栽亦活。”对于植物学的兴趣，鲁迅一直保持到了以后。

鲁迅小时候也有一片“乐土”，那就是农村。在那里他就再也不要念那些讨厌的孔孟之道，也不要再过囚禁一样的私塾生活了。他说：“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

(《鲁迅全集》第七卷第632页)那时鲁迅的外婆家住在离城三十多里的皇甫庄，这个村子很大，有四、五百户人家。绍兴是水乡，到处是水，一块一块陆地好象飘浮在水上一样。坐了一条船，水乡的什么地方都可以到，有的甚至可以到一户人家的后门口。有的地方，甚至整个村庄里都被好几条小河隔开。于是绍兴又有很多桥，把一块块陆地接通。绍兴有这许多水，土地当然很肥沃，称为鱼米之乡。但明清时期的绍兴，是陈、赵、袁、杜、徐、李、胡、田八大地主的天下，接着又有豆姜鲍家和宋家等大地主，绍兴四乡的农民，差不多都是他们的佃户，过着极为痛苦的生活。

鲁迅视农村为“乐土”，是因为他到了农村就可以挣脱孔孟之道的束缚，并且同许多热情好客的农民孩子相交往。后来他在《门外文谈》中说：“中国是在有文字以前，就有了文艺的”，并说：“文艺是劳动人民创造的。”《门外文谈》是一部通俗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起源史和发展史。鲁迅说，小时候到农村去，在那里听农民讲故事，讲的人往往有一定的技巧，很生动，另外的人都围着坐下来听他讲。把他们讲的故事记下来，就是作品，讲的人也就是作家了。鲁迅在皇甫庄等地就曾听到了好多反映农民的思想、要求和愿望的民间故事。他在皇甫庄和农民孩子们一起唱儿歌，现在从《越谚》这部书中还可以看到。《越谚》是一个叫范寅的人收集的。

鲁迅小时喜欢看戏。皇甫庄这个地方，因为村子大，经常演戏。演的都是社戏，什么菩萨生日演什么戏。鲁迅说他小时候不知道有演给人看的戏，只知道是演给菩萨看的，人去看戏是叨菩萨的光。可见那时神权统治的厉害。皇甫庄演戏的演员，一种是专业演员，专门演帝王将相。皇甫庄村旁有个叫包殿的地方，专业演员的戏在这里演出。包殿前面有个湖是绍兴

最大的湖之一，叫贺家池。演戏时，台搭庙前，半个在岸上，半个在河里，叫河台。看戏的人可在岸上看，也可以在船上。有些人喜欢自由些，往往撑着船去，站在船上观看。还有一种是临时演员，演的地点在火烧场，都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临时合起来演出。这种演员演的是目连戏。后来鲁迅在文章里对专业演员演的戏讲得不多，他在小说《社戏》里也只是歌颂一起去看戏的农民孩子们的崇高品格，提得较多的是目连戏。鲁迅自己的文章记载，他曾在目连戏里扮演过小鬼。薄暮中，目连戏即将开演，十几匹马站在台下，一个职业演员扮好了一个鬼王，蓝面鳞纹，手执钢叉，还得有十几名鬼卒，普通的孩子们都可以应募。鲁迅和他的农民小朋友们跃上台去，说明志愿，演员就在他们脸上涂上几笔彩色，每人给一柄钢叉。待到有十多个人了，即一拥上马，疾驰到野外许多无主孤坟处，环绕三匝，下马大叫，将钢叉用力地连连刺在坟墓上，然后拔叉驰回，上了前台，一同大叫一声，将钢叉一掷，钉在台板上。小孩子们的责任就算完结，洗脸下台，可以回家了。但倘被父母知道，就不免挨顿竹条，一以罚其带着鬼气，二以贺其没有跌死。鲁迅倒一直没有被父母和亲友觉察过。

鲁迅说：“目连戏所邀请的看客，范围可较广了，自然请神，而又请鬼”。又说：“自然，自杀是卑怯的行为，鬼魂报仇更不合于科学”，但“明社垂绝，越人起义而死者不少”，“我们就这样的一同招待他们的英灵”。（《鲁迅全集》第六卷第500页）因为目连戏里有较重的迷信成份，所以鲁迅在写《门外文谈》时，曾特地请周建人同志的夫人王蕴如同志把市场上的目连戏的刻本都收集来。鲁迅将刻本的目连戏同乡下农民演出的目连戏加以对照，发现绍兴农民演出的目连戏除《小尼姑下山》这一场和刻本相同外，其余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一些讽喻

性小故事的串连，于是，他就把武松打虎这一节的情节，收入了他的《门外文谈》中。在《门外文谈》中说，这是农民的作品，他们的成就，是可以同世界上最有名的寓言家相比而毫无逊色的。鲁迅对目连戏中的无常和女吊这两个人物印象最深。一九二六年，他专门写了《无常》一文，收在《朝花夕拾》中，一九三六年临终前一个月左右，又写了《女吊》一文，歌颂妇女对黑暗社会的反抗和复仇。鲁迅写《女吊》时，问周建人同志开头两句怎样唱的。周建人说是：“奴本是良家女，啊呀！苦呀！天哪！”并指出这句话有个字不太好，就是“良家女”的“良”。因为这个人在做童养媳时，受到公婆虐待，被迫上吊而死。童养媳一般穷苦人家也有的，旧的婚姻制度，一到领童养媳的人家，那人家就不良了。所以周建人同志认为这个“良”字用得不好。怎么写呢？鲁迅想了一想后改了一个字：“奴本是杨家女”，“良”改为“杨”字。一直到那时，鲁迅对这个人物仍很感兴趣，他认为鬼这个事情是不科学的。绍兴叫“讨替身”，鬼去找一个人来代替自己，自己就可以再去投生做人，也是不科学的，是封建迷信的东西。但他对这个人物的反抗和复仇的性格很感兴趣，直到他去世前两天，还在一个朋友家里谈到了“女吊”。

鲁迅在皇甫庄的时候接触了不少刚健、清新的民间文艺，对他以后的文艺创作带来不小的影响。这在他以后的小说和杂文中都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他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就说：“新近看见一种上海出版的期刊，也说起要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他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

于背了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鲁迅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深入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他说：“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63—364页）可见群众的语言（包括农民的语言）和民间的文艺，曾是后来鲁迅文艺创作中的滋补养料。

正当鲁迅沉浸在农民创造的艺术中的时候，他的家里忽然发生了一场很大的变故。鲁迅十三岁那年的除夕，他的曾祖母忽然去世。一个月后，鲁迅的祖父就从北京赶回到了家里。第二年，正值浙江考举人，监考官（即学台）据说是鲁迅祖父认识的。当时，鲁迅家里有一个亲戚叫章介谦，道墟镇人，是鲁迅祖父的姐夫，他有两个侄儿要去考举人，就叫鲁迅祖父去说情，鲁迅祖父感到为难不肯办，后来推不掉，就写了个条子。姓章的就把这个条子和钱庄的一张期票一起塞在信封里，派一个人送到乡下。据说那时的学台平时是在北京的，要到考举人的时候才到省里来，而学台到了考地后又不能拆私信的，这当然是官样文章。当章家的信送到时，据说学台刚好同抚台在谈话，于是学台就把信放在一边。但送信的人不完全明白内情，心想信里有这么多钱，怎么不给我回条呢，就叫了起来，学台只好把信交给抚台，说你看看吧。抚台一看，是通关节的，拿着就走。走了之后马上向光绪皇帝报告，说周福清搞这个名堂。其实，在清朝时这样舞弊的事多的是，根本不算是怎么一回事的。光绪抓住这个事就大做文章。因为那时候，帝国主义不断侵略中国，人民不断起来造反，他想抓住这个事情来吓吓人民，所以马上批示把周福清抓起来。恰巧审理这个案件的杭州知府陈鹿笙与鲁迅祖父很熟悉，两人较有感情，就帮了一点忙，写了一个奏折给光绪皇帝，当然都是孔孟之道的一

套，说周福清是个孝子，母亲死了后，神志模糊不清，我想把他关一段时间，等神志清楚了以后再审理上报。陈鹿笙并帮周福清租了三间房屋，在杭州三牌楼地方，而且允许他家里派几个人去陪他，结果是去了三、四个。其他人都能出来，就是他祖父不能出来，一共关了五、六年。

当这个案件刚发生时，鲁迅家里的男人都逃走了，因为清朝的法律，一人犯法可以满门抄斩，至少是要捉其他的男人去抵押的。他祖父也去避难了。会稽县衙门皂役手里拿了小木牌经常到新台门来捉人，一走进新台门就喊：“捉拿犯官周福清，捉拿犯官周福清。”一时间气氛很紧张，后来鲁迅的祖父就自己到杭州去投案了。

当家里的男人都出外逃难时，鲁迅也被送到皇甫庄去寄居。皇甫庄有他的很多农民朋友，是他所熟悉的地方，也是他所喜欢的地方。当然，现在的“避难”同过去的作客，心情是很不一样的。但因此也使鲁迅对农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压迫下的苦难生活，有了更多的体会。这里农民的苦难生活、水上的风光、夜晚的渔火、水草的清香、社戏的场面，都在日后鲁迅的作品中留下了清晰的图景。所以现在很多到皇甫庄去参观的人，对于那里的自然环境，总好象见过面，水上的船，水下的虾，游动的鱼，岸上的罗汉豆和摘罗汉豆的那些纯朴可爱的农民孩子和热情好客的贫下中农们，都好象是见过面的。到了那里后，大家对鲁迅小说《社戏》等的体会确实是更深了。

可是寄居的鲁迅不久就得离开皇甫庄。因为这时鲁迅的两个舅父已开始分家，他外婆和小舅舅回到了祖宅安桥头，大舅父迁到了小皋埠，一个堂舅舅移居去鸡头山。两个舅父分居时，寄食的鲁迅就跟着大舅父到了小皋埠，住在胡、秦两家

地主共有的“当台门”里。鲁迅在《自传》中说：“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居住在一个亲戚家里，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

回家以后，鲁迅仍然到三味书屋读书，但不久他的父亲就病倒了。父亲病中的遭遇，以后他曾写过一篇回忆散文，就是《父亲的病》，非常严厉地批判了几个医生的医疗作风。

二千多年来，在医学领域里，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孔老二这个儒家的祖师爷，竭力鼓吹“死生由命”，汉代的反动儒家董仲舒，也宣扬“天人合一”，他们用天命论欺骗人民、愚弄人民，把“天”说成是生老病死的主宰者。与此相反，历代劳动人民和法家进步医生，与儒家的天命论斗，与各种疾病斗，与自然界斗，从而创造出了灿烂的中国医药学。

鲁迅父亲卧床三年多，受尽了“医者，意也”的儒医们的敲榨勒索和欺骗。对于鲁迅父亲说，由于这些儒家医生的骗人术而失去了一条性命，对鲁迅说，不但失去了自己的父亲，而且由于找寻他们所开的奇特药引，而失去了三年多的宝贵光阴。因此，鲁迅对他们的恶劣行径，曾经引起了强烈的不满。

据了解，给鲁迅父亲看过病的有三个医生，第一个姓冯，第二个是姚芝仙，第三个是何廉臣，都是当时绍兴的所谓名医，医疗费很贵，简直到了敲榨的程度，看一次一元四角。鲁迅说：“那时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张罗的了；又何况是隔日一次。”（《鲁迅全集》第二卷第258页）架子很大，都是坐轿子来的，据周建人同志说：“医生自己拿一元，几个轿工拿几角。”这三个医生都是儒医，最后要脱手的时候，都是说什么“医能医病，不能医命”，“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那时他祖父在杭州坐牢，需要钱，那里许多关系要打交道，要